

杜甫研究論文集

三 輯

中 華 書 局

杜甫研究論文集

三 輯

中華書局

杜甫研究論文集

三 輯

*

中華書局編輯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1/32·12 3/4 印張·287,000 字

1963 年 9 月第 1 版

196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7,200 定價: (9) 1.75 元

統一書號: 10018·351 63.7 京型

60/17-25
12

出版說明

今年是我國古代偉大詩人杜甫(712—770)誕生的一千二百五十週年紀念。1961年12月15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團會議上,決定將杜甫列為今年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今年4月,在我國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中,也展開了有關杜甫紀念的活動。為了配合這一紀念活動,為了反映近幾十年來杜甫研究的情況、保存歷史資料以及推動研究的更為深入,我們特選錄報刊上的有關論文,編輯這個集子。第一、二輯已經編成,收“五四”至1961年底為止所發表的論文。本書是第三輯,所收的論文起自今年1月,至9月底為止。凡可備一說、足資參考的,即選錄在內。

這一輯所包括的時間僅九個月,文章的內容比較集中,因此我們把所收的三十六篇論文,按其內容性質分列為五部分,即:總論杜甫的生活、思想與創作,概論杜詩的藝術風格、藝術特點,論杜甫的文學思想,單篇作品分析,資料介紹。每一部分則大體以發表的時間先後排列。書末附論文目錄索引,供讀者參考。

1962年10月

目 次

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	郭沫若 (1)
紀念偉大的詩人杜甫·····	馮 至 (5)
人間要好詩·····	馮 至 (18)
杜甫的價值和杜詩的成就·····	馮文炳 (22)
人民詩人杜甫·····	蕭滌非 (34)
偉大的時代歌手·····	蔣和森 (45)

——杜甫的生活與創作

“詩史”淺論·····	馮 至 (59)
杜詩給予南宋愛國詩人的影響·····	高熙曾 (76)

*

*

*

沉鬱的風格, 閔美的詩篇 ·····	傅庚生 (85)
讀杜瑣記·····	方 管 (94)
青松千尺杜陵詩·····	吳調公 (103)

——論杜甫詩歌的美學觀

碧海掣鯨手·····	蔣和森 (120)
------------	-----------

——杜詩的氣魄

思飄雲物動 律中鬼神驚·····	馬茂元 (129)
------------------	-----------

——談杜甫和唐代的七言律詩

論杜甫入蜀以後的絕句·····	夏承燾 (145)
“沉鬱頓挫”試解·····	安 旗 (152)

*

*

*

論《戲爲六絕句》·····	馬茂元 (160)
杜甫的文學思想·····	王運熙 (173)
別裁僞體，轉益多師 ·····	蕭滌非 (182)
	廖仲安
	* * *
杜甫《羌村》章句釋·····	胡小石 (198)
杜甫《北征》小箋·····	胡小石 (205)
說杜詩《旅夜書懷》·····	劉開揚 (219)
讀杜甫的《閣夜》·····	陳友琴 (223)
杜詩《江漢》試解·····	劉開揚 (226)
杜甫的《八哀詩》·····	朱東潤 (231)
談杜甫的《洗兵馬》·····	詹 鎔 (238)
說杜詩“畏我復却去”·····	吳小如 (249)
一個小問題 紀念大詩人·····	蕭滌非 (251)
——再談杜詩“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	
杜甫《秋興》八首的藝術特點·····	馮鍾芸 (260)
談《秋興八首》·····	方 管 (277)
論杜詩《秋興八首》香稻碧梧句·····	李廣田 (288)
“紅稻”——關於杜詩裏的一個字的問題·····	普 暄 (294)
	* * *
王嗣爽和他的《杜臆》·····	劉開揚 (296)
關於《杜臆》的作者王嗣爽·····	柴德賡 (305)
杜集敘錄·····	萬 曼 (311)
杜甫詩集的幾種較早刻本·····	叔 英 (346)
杜詩版本目錄·····	馬同儼 (350)
	姜炳旂
[附]報刊論文目錄·····	(395)

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①

郭沫若

在八世紀初期，我國唐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有了高度的發展。它不僅在中國的封建文化史上形成了一個高峰，而且對世界文化也有極大的貢獻。中國的造紙法，就是在這個時期，經過中央亞細亞，再傳到歐洲去的。絕對的年限有人說是公元716年，也有人說是750年，但總是在八世紀的上半期。造紙法的推廣應該是推動世界文化前進的一個巨大的物質力量。

但是，到了公元755年却爆發了有名的安史之亂，就是安祿山和史思明的叛亂。這個叛亂經歷了七、八年之久，使中國的中原地帶遭受到極大的破壞。單拿人口的死亡來說，由754年的約五千三百萬人，減少到764年的一千六百餘萬人。人口減少了70%。叛亂平定後，唐代的統治雖然還維持了下來，然而地方割據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外族不斷侵入，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不斷地尖銳化，已經遭受了嚴重災難的人民在重重的壓迫和剝削之下繼續遭受着難以形容的慢性的災難。

偉大的詩人杜甫（712—770）正生活在這樣變化急劇的時代。他的生活就和時代的急變一樣，彷彿由天上掉到了地下。從755年以後一直到他的逝世，十五、六年間所渡過的基本上是流浪的生活，飢寒交迫的生活，憂心如搗的生活。但就在這樣的生活當中，他

① 這篇東西本來是紀念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五十週年會上的開幕詞。《光明日報》希望全文發表，我同意了。我對於原文略略有所刪改，而另外安上了一個題目。

接近了人民，和人民打成了一片。這就使得他有了機會認識到封建制度下的階級社會的本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響徹千古的名句，不在這樣的生活中是不能產生的。

安史之亂在歷史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然而也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偉大的詩人。沒有經過安史之亂以後的生活，不會與人民同呼吸、共患難，杜甫是不能成其為杜甫的。他的現存的詩篇有一千四百多首，90%左右是安史之亂以後的作品。他的早期的作品，數量既少，質量也並不很高。從這一個角度來說，安史之亂對杜甫是不幸中之幸，對中國文化也是不幸中之幸。這由無窮的血淚換來的杜甫，中國人民向來就寶貴他，今後也永遠要寶貴他。

時代和境遇逼迫着杜甫不能不睜開內在的眼睛，不能不“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一年到頭在替老百姓發愁、傷心，感覺着心肝五臟在受着煎熬）。這就是他的詩歌能有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他對於人民的災難有着深切的同情，對於國家的命運有着真摯的關心，儘管自己多麼困苦，他是踏踏實實地在憂國憂民。而這憂國憂民的熱情，十餘年間，始終沒有衰歇過。安史之亂以後，舉凡政治上、經濟上的重大事件，杜甫所能接觸到的人民的疾苦和願望，他用他的筆蘸滿着血淚，把它們寫了出來。他的詩歌是當代的一面鏡子。他所反映的現實，既真實而又生動，沉痛感人，千古不朽。實在的，艱難玉成了我們的詩人。

杜甫是盡了他的最大的努力，發揮了他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為有骨氣的人，他沒有在困難面前低頭。作為傑出的詩人，他更是發揮了他的力量。請看他作詩的秘訣吧。他不是說過“語不驚人死不休”嗎？他是拚着他的生命在那兒寫詩的。他的寫作態度是多麼認真、刻苦，嘔心瀝血！他的親密的朋友，我們中國的另一位偉大詩人李白（701—762），也曾經說過：杜甫做詩太辛苦了，他把身子搞得

很瘦^①。這應該是知道甘苦者的說話，“鐵杵磨成針”的故事，不是和李白本人關聯着的嗎？任何有成就的歷史人物，莫有不是從勤學苦練中得來的。杜甫自不能例外。他和人民同命運、共甘苦，既從現實生活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又向古代的詩人和民間的詩歌虛心學習，把古代的和民間的語言加以錘煉，而創造性地從事詩歌天地的開拓。因而他的詩歌便十分突出地具有嚴格的格律、深刻的表現、充沛的氣勢、雄厚的魄力，形式與內容相合無間，而使人不得不深受感動。思想性和藝術性，在杜甫的詩歌裏，得到了高度的結合。這就是從勤學苦練中所得來的碩大的果實。

我們在這裏需要特別指出一點：杜甫詩歌的思想性的特徵之一，是反對戰爭，渴望和平。這是在他詩歌中所貫串着的一條紅線。這是代表着人民的共同願望的。但和一般的人民一樣，杜甫所反對的戰爭是侵略性的戰爭，他所渴望的和平是無侵略的和平。在他的前期，處在所謂開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和他下面的一些窮兵黷武者，企圖開拓疆土，四處發動戰爭，結果搞得民窮財困，四處打敗仗。那時的戰爭是不義的戰爭，杜甫是無條件地反對的。作於751年的《兵車行》，便是絕好的代表作。但到安史之亂以後，情況便不同了。自那時以後，唐朝衰頹了下來，中國時時受着外來的侵犯，有時連首都都淪陷了。這時期的杜甫是在沉痛中反抗侵略的，作於759年的《新婚別》，便是典型的例證。詩裏寫一位新嫁娘，剛剛結婚一天，第二天的清早便送她丈夫出征。她在沉痛之中向她丈夫說：“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這很深刻而鮮明地表明了人民的愛國心，也很深刻而鮮明地表明了杜甫是一位反侵略的愛國詩人。

① 《唐詩紀事》卷十八李白項下有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詩爲李白集中所不載，學者或疑爲僞。但和杜甫作詩的態度相符，恐未必即是假托。

當然，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歷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飯不忘君”，便是無可掩飾的時代殘疾。他經常把救國救民的大業，寄托在人君身上，而結果是完全落空。封建時代的文人，大抵是這樣，不限於杜甫。這種時代殘疾，我們不必深責，也不必爲他隱諱，更不必爲他藻飾。例如有人說杜甫所忠的君是代表祖國，那是有意爲杜甫搽粉，但可惜是違背歷史真實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來研究杜甫，學習杜甫，去其糟粕而取其精華。學習他，我們同時要超過他。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新文藝，特別是社會主義的新詩歌。

我們今天在紀念杜甫，但我們相信，一提到杜甫誰也會連想到李白。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樣的好朋友。他們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雙子星座一樣，永遠並列着發出不滅的光輝。李白比杜甫大十一歲，他主要代表了開元時代，但他對於所謂開元盛世並不是盲目陶醉的。他早就預感到在那虛假的昇平景象之下會發生急變，而且想親身干預這種急變。在安史之亂以後，他雖然還生活了七年，但他是生活在比較安定的東南地區，他對於流離戰亂的情境沒有親身的經歷，故把詩歌賽跑中的接力棒移交給杜甫了。他們兩位都稱職地完成了他們的時代使命，是毫無疑問的。今年是杜甫誕生的一千二百五十週年，也恰巧是李白逝世的一千二百週年。我們希望在紀念杜甫的同時，我們的心中也能紀念着李白。我們要向杜甫學習，也要向李白學習，最好把李白和杜甫結合起來。李白和杜甫的結合，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結合。

詩歌的接力棒又在我們的手裏了。我們要無愧於李白和杜甫。我們要不斷地努力，在三面紅旗的照耀之下，爲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詩歌、新文藝，而貢獻出全部力量，完成我們的時代所交給我們的文藝使命！

（《光明日報》1962.6.9）

紀念偉大的詩人杜甫

(在世界文化名人——中國偉大詩人杜甫誕生 1250 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

馮 至

杜甫遺留給我們一千四百多首詩。這個數目不算不多，此外却還有許多詩是失散了。他生前既沒有像白居易那樣熱心編訂自己的詩集，死後他的詩也沒有像王維的詩那樣由皇帝詔令編進，他的詩集是到了北宋時才由杜詩的愛好者廣事搜羅，精心審定，逐漸編輯起來的。杜甫在安史之亂以前就說過，他已經寫了一千首左右的詩，可是在他的全集裏，前期的詩只保存了一百多首。就是安史之亂以後的詩，也難免沒有遺失。杜甫的詩集雖然有這無法彌補的缺陷，但我們如果按照編年的次序來讀，却像是在讀一部有組織的完整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不同體裁的、獨立的篇章，也有不少計劃周密的組詩，而且每個階段的詩有每個階段的特點，可是總的看來，則從頭到尾構成一個整體，有如一座璀璨壯麗、豐富多彩的大廈。

杜甫的詩一向被稱為“詩史”。這部“詩史”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他那時代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並對許多重要問題表達了作者的進步主張；它還有聲有色地描繪了祖國壯麗的山河、新興的城市，以及一些蟲鳥花木的動態；在自然的圖景和社會的變化中，它也敘述了作者不幸的遭遇和內心的矛盾，抒發了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和迫切的願望，所以它也是作者的忠實的自

傳。它和屈原的辭賦、司馬遷的《史記》、施耐庵與曹雪芹的長篇小說一樣，經緯縱橫，包羅萬象，給讀者一個豐富而又完整的印象。

我們翻開杜甫詩集，一開始就會讀到他早年寫的《望嶽》，“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再讀到他晚年的詩，又有《登岳陽樓》裏“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那樣的名句。泰山卓立在齊魯的平原，洞庭湖的東南劃分了吳楚的疆界，一在全集的開端，一在全集接近結束的地方，中間有如長幅的畫卷一般，展示出秦川的雲樹、隴右的關山、蜀地的峰巒和江水，杜甫都用他雄渾的詩筆一一加以描繪。在這壯麗的大自然中他也從不曾忽略動物界、植物界的優美景物。他的詩反映時代的重大事件和社會矛盾，從來沒有間斷過，從長安時期的《兵車行》直到在湖南寫的《歲暮行》，有無數感人的詩篇，記載了國家的災難和人民的痛苦。至於他個人的思想感情，從早年“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抱負到晚年“欲傾東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的理想，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的“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到逝世前一年寫的“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江漢》），儘管是心情起伏，變化多端，他憂國憂民的積極精神却是首尾一貫的。這一切使人感到，好像全集的結構詩人早已設計好了似的。這當然是不可能的。至於杜甫詩集所以能顯示出這樣的完整性和一貫性，主要是由於杜甫愛國愛民的政治熱情是始終不渝的，他忠於藝術的創作熱情是一生不懈的。今天我們紀念這個偉大的詩人，試圖對於他的政治熱情和創作熱情作一些敘述。

杜甫的時代是唐代封建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時代。杜甫青年時，還經歷了所謂的開元之治。但當時由於貴族官僚、地主豪商，以及寺院僧侶都廣置莊園，兼並土地，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農業發

展的均田制遭到破壞，大量農民失却土地。以均田制為基礎，對中央政權起鞏固作用的府兵制也難以維持下去，隨後各地節度使招募兵士，長期率領，地方勢力逐漸強大。更加上以唐玄宗為首的統治集團日趨腐化，對內橫徵暴斂，對外連年進行掠奪性的戰爭，使得貧富懸殊越來越大，階級矛盾越來越深，最後爆發了成為唐代由盛到衰的轉折點的安史之亂，並且導致了鄰近民族的不斷進攻和此伏彼起的長期內亂。廣大的人民在這時期擔受着各種各樣難以想像的苦難。杜甫個人的生活也同樣發生顯著的變化，他從一個官僚家庭的子弟轉變為一個常常衣食無着、貧病交迫的“衆人”（他自己常說：“生涯似衆人”〔《上韋左相二十韻》〕、“老逐衆人行”〔《悲秋》〕）。由於個人的貧困，他逐漸接近貧困的人民，深切地體會到人民的哀樂和願望，同時他念念不忘國家的危機和民族的命運，因此他寫的詩便成為這個錯綜複雜、變化多端的時代的一面鏡子。

這面鏡子所照映的事物，不是浮光掠影，也不是些煩瑣細節，而多半是轉變過程中帶有關鍵性的重要事件。當唐玄宗在天寶年間對外進行掠奪性的戰爭，連遭失敗，人人負擔着過度的賦稅和徭役時，杜甫寫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兵車行》。這首詩雖然是從父母妻子送別行人寫起，詩人主要的着眼點則在於“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和“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他想到的是有關國計民生的農業生產和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當唐代的統治集團集中天下財富，驕奢淫逸的生活達到極點，安史之亂的爆發已迫在眉睫時，杜甫一再指出尖銳的社會矛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給這個日趨腐爛的社會敲起的緊急的警鐘。安史之亂延續了七年多，杜甫的憂思焦慮完全貫注在平復叛亂和人民的痛苦生活上邊，但他同時也高瞻遠矚，看到當時的當政者由於只顧燃眉而忽略了的兩件大事：一件是借

用少數民族兵力平定叛變會帶來無窮的後患，一件是西方的防務空虛會引起西方民族的進攻。爲這些隱憂他寫了不少詩篇，事實上過了不久，杜甫所擔心要發生的事都成爲慘痛的現實。像杜甫這樣具有政治敏感，既能博覽全局，又能洞察隱微，不只是在他同時代的詩人中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就是過去歷代偉大的詩人中也是不多見的。至於陳述人民的痛苦，諷諭皇帝的昏庸荒淫，揭發地方官吏的殘暴跋扈，杜甫無論在什麼時候，都看作是詩人在他的時代裏應盡的職責。他運用不同的詩體，有時直陳其事，有時通過比喻和寓言，寫得委曲婉轉，有時也把深刻的體驗和認識概括爲簡練的詩句，像“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寫懷》）、“盜賊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喪亂死多門”（《白馬》）等句包涵有多麼豐富的內容！此外還有個別篇章以高度的藝術手腕，簡要而明確地敘述了幾十年的巨大變化（如《憶昔二首》），直到現在，還常被歷史家所徵引。

杜甫的詩反映現實，能够這樣深刻，主要是因爲他觀察事物，一切都是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這一點最突出地表現在他對待戰爭的態度上邊。杜甫寫過許多關於戰爭的詩，但是戰爭的性質不同，杜甫對待的態度也不一樣。在那時，有皇帝窮兵黷武、邊將貪功圖利、對其他民族的掠奪性的戰爭，有國家危在旦夕、鎮壓叛亂的戰爭，有抵禦其他民族進攻內地的戰爭，有各地將領擁兵自主、互相殘殺的內亂，還有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這種“萬國皆戎馬”的局面，不知引起詩人多少次的“酣歌淚欲垂”（《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直到他死亡前夕最後的一首長詩裏還嘆息着戰血長流，軍聲不息。他深深認識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是深重的，“喪亂死多門”是一句有力的概括。但是杜甫並不像過去一部分文學史家片面地所理解的，是一個無條件的非戰論者，他對於不同性

質的戰爭有不同的看法。有害於人民和國家的侵略戰爭，他是反對的；有關民族命運和國家生存的反侵略戰爭，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是擁護的；各地軍閥的內亂，他是深惡痛絕的；至於農民起義的意義，杜甫還認識不清，可是他已經看出“盜賊本王臣”的道理，這在當時可以算是最進步的觀點了。

前邊提到的《兵車行》是對於唐玄宗君臣不顧農業生產，不管人民死活，一味在邊疆發動戰爭的抗議。同時杜甫在《前出塞》裏也提出詰問，“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他後來回憶當時征伐的情景，是“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去如泥，尺土負百夫”（《遣懷》），一寸寸的土地都要用大量的生命和財富來換取。這種侵略戰爭所得的後果一方面是田園荒蕪，農業生產衰落，一方面是播下了民族間互相仇恨的種子。關於前者，《兵車行》裏已經說得很沉痛，在另一首晚年的詩《又上後園山脚》裏也指出來，“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關於後者，例如吐蕃和唐本來是甥舅一家、友好和睦的，但在天寶年間，玄宗任使哥舒翰對吐蕃大事殺伐，傷害了民族間的感情，等到唐朝的勢力衰弱時，吐蕃便一再進攻。杜甫對於這種後果看得很清楚，他說：“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烟塵，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

對於鎮壓安史之亂和抵禦外侮的戰爭，杜甫則採取與之相反的肯定態度。他被困在淪陷的長安時，寫出關心軍事動態、充滿愛國精神的《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等名篇。後來逃至鳳翔，任左拾遺，寫過許多送友人赴任的詩，在提到“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殷切地勉勵友人“垂淚方投筆，傷時即據鞍”（《送楊六判官使西蕃》）的同時，也關心到西方邊陲的危機，“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送

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在唐軍反攻的期間,他寫的《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觀兵》等詩都無異於鼓舞士氣的雄壯的戰歌。他心中燃起的對於叛逆敵愾同仇的火焰始終沒有停息過。代宗廣德元年,杜甫流離川北,吐蕃攻陷松、維、保三州,他寫出悲壯的《歲暮》:“歲暮遠爲客,邊隅還用兵。烟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這類詩在他的詩集裏是數見不鮮的。

國家大難當前,危在旦夕時,杜甫認爲,抵禦敵人是人民應盡的職責,他一再寫詩鼓勵。他在洛陽路上,看見一些橫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等都強徵入伍。他面對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替這些人提出沉痛的控訴,對那些差吏給以嚴厲的譴責,但是一想到目前壯丁缺乏,而又大敵當前,便轉變了口氣,盡可能對這些被徵調的人說幾句慰解或鼓勵的話。爲了國家的利益,他只好勸他們暫時忍受個人的痛苦,還是抵禦敵人要緊。這時他的心裏充滿了矛盾,使他寫成了撼動千古人心的“三吏”、“三別”。——同時他也沒有忘記農業生產,但是他的想法和寫《兵車行》的時候不同了,他在一首《喜晴》裏說:“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榮與麻。”這就是說,婦女在家,不慣於耕種黍稷,至於種榮種麻,還是可以勝任的,他再也不說“禾生隴畝無東西”了。

至於各地的軍閥官僚,橫徵暴斂,互相砍殺,不把唐朝的中央政權看在眼裏,這局面自從安史之亂以來,一天比一天嚴重。杜甫到了四川,四川是戰亂頻繁,到了湖南,湖南也發生騷亂。杜甫無論到哪裏,所看到的都是“哀哀寡婦誅求盡”(《白帝》)、“無有一城無甲兵”(《蠶穀行》)。杜甫對那些爭權奪利的“邊頭公卿”,口誅筆伐,寫過許多長詩和短句。他爲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總希望他們能够稍微照顧點民間疾苦,對皇帝表示擁護。但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

紀綱”(《入衡州》),這時皇帝的“權”,在均田制遭到破壞、府兵制業已廢弛的情況下,在內憂外患不斷發生的情況下,在嬖佞當權、皇帝昏庸逸樂的情況下,是再也振作不起來,因此紀綱也就無法維持了。

杜甫在這混亂的封建社會裏,“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入衡州》),總是把改善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對於不自振奮的皇帝,時而規勸,時而諷諭,有時也進行大膽的揭發,幻想皇帝能行儉德,有一番作為,不是迫切地喊出“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宿花石戍》),就是諄諄地論述“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有感五首》之四)。儘管他在詩裏苦口婆心,反復陳詞,這些話是不可能聽到皇帝的耳裏去的。他時常夢想“貞觀之治”的再現,但是造成“貞觀之治”的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都已不存在了。這是封建社會一個出身於統治階級而又愛祖國、愛人民的詩人在所謂君昏世亂的時代裏常常遇到的悲劇,到了皇帝或國王這一關,矛盾就無法解決了。這是屈原經歷過的悲劇,也是杜甫的悲劇。

杜甫在這樣的悲劇中,雖然也間或流露出消極的、感傷的情緒,但主要的是始終保持着旺盛的政治熱情。“尚思未朽骨,復睹耕桑民”(《別蔡十四著作》),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宇宙澄清的希望。他不曾像白居易那樣,在寫了大量能代民立言的諷諭詩以後(這些詩我們要給以很高的評價),在晚年寫了許多千篇一律樂天安命的閑適詩,並且用孟軻所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作為他政治熱情減退、態度轉為消極的根據。杜甫是達則兼善天下,窮却不肯獨善其身。他在肅宗時充當過短時期的諫官左拾遺,這本來說不上什麼“達”,他却不顧生死,充分執行了左拾遺的任務,因而引起皇帝的不滿,他從此與長安永別,流離半生。對於朋友,他也經常勉勵以國事為己任。嚴武入朝時,他向他說,“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